

第三轮修改

尊敬的编委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心理科学》编委老师的意见。我们仔细阅读了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并根据意见对稿件做了修改和完善。以下是对审稿意见的详细回复。修改内容在正文中用紫色字体进行了标注，请编委老师审阅。

回应编委老师一意见：

请作者再次对摘要进行修改。有多篇论文因为摘要问题，在终审阶段被拒稿。本文摘要中，“集体欢腾的内涵、产生条件和研究方法已发生流变，其不仅具有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社会心理效应，还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影响。”与什么相比发生流变？“其”指代什么？对什么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影响？请作者仔细提升摘要质量。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提醒和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对摘要部分做出了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摘 要 集体欢腾最初来源于集体仪式，现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世俗聚会中的“团结粘合剂”。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世俗聚会集体欢腾与涂尔干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相异。与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相比，世俗聚会集体欢腾的内涵、产生条件和研究方法已发生流变，其具有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社会心理效应，且该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影响。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集体欢腾的消极影响以及线下与线上集体欢腾的差异，深化揭示集体欢腾效应的持续性影响机制。

最后，感谢编辑老师再次审阅我们的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极具建设性，提升了文章的逻辑性、严谨性和通畅性。

此致

敬礼！

所有作者

第二轮修改

尊敬的编委老师与审稿专家：

您好！

非常感谢《心理科学》编委老师和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仔细阅读了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并根据意见对稿件做了逐一修改和完善。以下是对审稿意见的详细回复。修改内容在正文中用红色字体进行了标注，请审稿专家审阅。

回应编委老师一意见：

请作者针对评审意见修改论文。另，请再仔细审读全文，包括语言表达，标点符号，引用和参考文献格式，英文摘要等。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对评审意见做出逐一修改。此外，我们对全文的内容、语言表达、标点符号、参考文献及引用格式、英文摘要进行了校对和审查。

回应审稿专家一意见：

修改稿已经得到很大改善。还有一点小建议，修改后同意发表：

意见 1：

第 1 节标题“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的集体欢腾的区分”，把“涂尔干”和“心理学”相提并论似乎不妥，两者不是一个层级的，可以考虑改为“集体欢腾：社会学与心理学视野下的区分”。而且前两段文字（蓝色）作为总体背景性介绍，宜放在第 1 节之前（作为 pre-introduction），而不是 1.1 内部，因为这还暂时不涉及区分。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肯定和指导。我们十分赞同您的观点“涂尔干和心理学不是一个层级的”。根据您的意见，我们把“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的集体欢腾的区分”改为“集体欢腾：社会学与心理学视野下的区分”。另，我们已把前两段文字（蓝色）放在第 1 节之前作为总体背景性介绍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个人情绪会因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集体欢腾是在大型集体活动中，如阅兵典礼、音乐会、体育比赛或民族节日上，你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同步化。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个时刻，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刻，可能是观众在欣赏一些美妙音乐的时刻，可能是中华民族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亦可能是奥运会运动员夺冠的时刻。这是一群甚至可能不认识彼此的人共同进行同样的事所带来的一种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便以部族、村落等方式群居，除了与宗教相关联的集体仪式外，

还创造了许多世俗中集体参与的集体欢腾活动。例如：中国各民族的民间集体传统节日中，常见集体欢腾现象。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人人手持火把，齐步奔走，最后将手中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巨大的篝火，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在载歌载舞中集体狂欢。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傣族的泼水节等民族文化习俗亦是民间集体欢腾的体现。个人的情感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强烈的集体情感，收获一种与有荣焉的幸福感。

1 集体欢腾：社会学与心理学视野下的区分

1.1 内涵上的相异性

.....

意见 2:

第 2 节只有 2.1 而没有 2.2，一般多级标题至少要有两个小点，否则应考虑调整层级结构。建议去掉 2.1 标题，把 2.1.1~2.1.4 改为 2.1~2.4。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去掉 2.1 标题，并把 2.1.1~2.1.4 改为 2.1~2.4。

意见 3:

第 3 节第一句话末尾的冒号宜改为句号。

回应：感谢您的提醒。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把第 3 节第一句话末尾的冒号改为句号。

最后，再次感谢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再次审阅我们的文章，感谢您们的无私指导。

此致

敬礼！

所有作者

第一轮修改

尊敬的编委老师与审稿专家：

您好！

非常感谢《心理科学》编委老师和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仔细阅读了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并根据意见对稿件做了逐一修改和补充。以下是对审稿意见的详细回复。修改内容在正文中用蓝色字体进行了标注，请审稿专家审阅。

回应审稿专家一意见：

意见 1：

论文多次提及 Durkheim 的集体欢腾理论，但对其局限性（如过分强调宗教仪式，对世俗聚会的集体欢腾解释不足，缺乏对负面效应的探讨等）的阐述过于简略。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指导。本文对集体欢腾理论的局限性的阐述不够充分和完整，因此我们在“4 问题与展望”部分另起一段对集体欢腾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补充。

具体补充内容如下：

3.4 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理论的局限性

集体欢腾理论是在 100 多年前的传统社会背景下，涂尔干通过对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二手资料进行推理和论证后提出的，其并不能对现代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首先，前文提到，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用来描述宗教仪式所产生的情感效果，并仅存在于集体仪式。集体欢腾在伴随重复刻板的仪式化和象征性的序列动作过程中产生，使其具有神圣化和仪式感特征。但有研究发现，集体欢腾普遍出现于世俗聚会，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Gabriel et al., 2020)。这说明集体欢腾理论过度强调宗教仪式下的神圣世界，而忽略了世俗世界中集体欢腾的普遍性和世俗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普遍存在于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现象。

另外，前文提到，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积极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但集体欢腾理论强调集体欢腾对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是极其短暂的，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个体需要每周定时重复参与宗教仪式。此外，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会因其狂暴性特征而引发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但目前对集体欢腾的描述以及产生的结果影响都是正面性的，而对于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并无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遗留的问题都说明了集体欢腾理论在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的解释力上仍有局限。

意见 2：

文献综述部分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地梳理不同学派对集体欢腾的理解和研究方法。部分研究成果的引用缺乏深度分析，仅停留在列举的层面，未能充分体现不同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对“2 集体欢腾变迁”部分做出了修改，我们将“集体欢腾变迁”修改为“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的区分”，然后再分小节分别阐述其在“内涵上的相异性”、“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 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的区分

1.1 内涵上的相异性

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个人情绪会因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集体欢腾是在大型集体活动中，如阅兵典礼、音乐会、体育比赛或民族节日上，你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同步化。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个时刻，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刻，可能是观众在欣赏一些美妙音乐的时刻，可能是中华民族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亦可能是奥运会运动员夺冠的时刻。这是一群甚至可能不认识彼此的人共同进行同样的事所带来的一种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便以部族、村落等方式群居，除了与宗教信仰关联的集体仪式外，还创造了许多世俗中集体参与的集体欢腾活动。例如：中国各民族的民间集体传统节日中，常见集体欢腾现象。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人人手持火把，齐步奔走，最后将手中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巨大的篝火，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在载歌载舞中集体狂欢。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傣族的泼水节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亦是民间集体欢腾的体现。个人的情感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强烈的集体情感，收获一种与有荣焉的幸福感。

集体欢腾由涂尔干于 1912 年正式提出，近 100 多年以来，经 Moscovici、Páez 等人在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基础上的扩展，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参与宗教仪式活动以及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正在下降(Twenge et al., 2016)。现代人很难从原始的集体宗教仪式中体验集体欢腾，也更难通过集体欢腾解决不同群体间的凝聚力。因此，集体欢腾的内涵演变也随之经历了从集体仪式到世俗的集体聚会的转变。起初，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把集体欢腾理解为一种神圣感，其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情境中被唤醒。如今，在现代社会中集体欢腾已被世俗化，即使在普遍的日常聚会中，集体欢腾也常常发生。集体欢腾的概念具有两个意义上的流变，第一为去神圣化（即世俗化）、第二

为去仪式化。

集体欢腾是个体在参与集体仪式活动时发生的个人情绪同步和强化的过程(涂尔干, 1999)。涂尔干最初创造集体欢腾是为了描述集体宗教仪式活动产生的情感效果, 即原始人的日常生活是很平静的, 而在集体仪式中却很兴奋、冲动和情绪激昂, 并将其归为是“神”的力量所致。在传统社会背景下, 涂尔干过于强调宗教集体仪式, 认为集体欢腾仅存在于集体仪式情境, 唤醒集体欢腾要求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 通过重复执行具有刻板性、象征性和强迫性的相同序列动作, 使得自我与他人发生重叠, 进而产生一种神圣感和自我超越感。在宗教集体仪式下, 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欢腾进入到神圣世界, 可以感受到世俗生活中体验不到的神圣感和仪式感, 其可以把神圣与世俗分开。

从变迁的角度看, 宗教集体仪式主要流行于传统社会, 而世俗聚会则主要流行于当下的现代社会。因此, 世界范围内集体欢腾也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世俗聚会的变化: 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较为多见, 宗教仪式下的集体欢腾不断式微。心理学研究者认为集体欢腾并不只存在于集体仪式中, 在世俗聚会中也常常发生, 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有研究发现在世俗聚会中有 3/4 的被试每周至少体验 1 次集体欢腾, 1/3 的被试每天都经历 1 次集体欢腾(Gabriel et al., 2020)。集体欢腾的核心要素除了神圣感外, 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普遍的联结感(Gabriel et al., 2017)和团结感(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3)。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少, 不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在音乐会、电影院、广场舞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 世俗聚会情境中的集体欢腾具有世俗化、去仪式化特征, 其并不是把神圣和世俗分开, 而是把日常的世俗变得有意义和神圣(Gabriel et al., 2020)。

此外, 涂尔干(1999)认为集体欢腾与所涉及的情绪类型无关, 不管任何情绪, 关键在于被分享。但有学者认为集体欢腾除了需要被分享之外, 更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情绪成分的融合和情绪同步。Rimé 和 Páez(2023)提出, 集体欢腾是指集体聚会的参与者由于体验到共享情绪而表现出的明显高涨的共享情绪状态, 其既涉及常规情绪(如喜悦、悲伤), 也涉及更复杂的情绪状态(如敬畏、集体自豪感), 并强调这些不同类型的情绪成分的融合, 以产生情绪的同步化, 从而到达高唤醒水平的集体欢腾。

1.2 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

集体聚会期间的情绪体验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 其中一些变量是激活集体欢腾不可或缺的标准(Collins, 2014)。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相较于集体仪式集体欢腾, 世俗聚会集体欢腾产生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已发生改变, 当前集体欢腾激活要素从认知、情感和行为

角度可以分别归纳为共享注意力、共享情绪和动作协调。

涂尔干(1999)早期提出,集体欢腾的产生条件有二:其一是注意力集中,即参与者需要有共同的注意力焦点;其二是情绪和行为表达的同步,即参与者在动作、手势等方面的同步。他认为一个群体同步他们的集体行为和注意力之后,将促进他们彼此的情绪同步,共享的情绪状态因个体间的相互强化而变得更加强烈。

随后,Wlodarczyk、Pizarro 等人在涂尔干的基础上,发展了集体欢腾新的产生要素。Wlodarczyk 等人(2020)认为集体聚会中集体欢腾的唤醒需要满足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人们聚集同一个场所,并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存在与互动(Collins, 2004),原因是高人群密度会强化和预测集体欢腾(Liebst et al., 2019);二是注意力同步,即有共同关注的焦点(Rennung & Göritz, 2016);三是在特定的集体聚会中个体间的有意协调。(Gabriel et al., 2017; Rennung & Göritz, 2016)。以上三个条件促进了集体欢腾的出现。

此外,Pizarro 等人(2022)认为集体欢腾的激活需要满足3个条件:其一,群体成员间的注意力同步;其二,群体成员间在行为层面趋于一致;其三,最重要的是群体成员间共享情绪。这三个条件的满足有助于个体的情绪体检得到强化并产生认知上的变化,群体意识战胜个人意识,从而唤醒集体欢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集体欢腾的被激活的核心要素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已发生改变。从认知和情感角度出发,不管是从注意力集中到共享注意力,还是从情绪同步到共享情绪,参与者在认知和情感上发生了个人到群体的转变,强调注意力和情绪并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体验,而是通过共享被整个群体所感知,群体成员间需要达到一种集体层面的共享状态。另外,从行为角度看,动作同步已演变为动作协调,这暗示集体欢腾的激活情景并不仅限于集体仪式,其普遍存在于世俗的集体聚会中。涂尔干认为动作同步是集体仪式中激活集体欢腾的必要条件。集体仪式中的动作同步是重复执行严格规定的相同序列动作,具有刻板性、强迫性和象征性(薛秋,尹可丽,2023),而动作协调不具有以上特征,强调人际互动性,参与者的动作不再是伴随仪式化的序列动作。

1.3 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

1.3.1 集体欢腾的传统研究方法

早期学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集体欢腾进行探索,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和环境的不可控性,很难采取纯粹的实验方法。因此,社会学家只能比较两个较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将两者间的共性作为控制变量,将异性做比较,从而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涂尔干主要采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即把两个以上的民族进行对照研究。例如,涂尔干(1999)选取

的研究对象来源于两个原始部落——澳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通过对这两个部落的比较研究发现集体欢腾起源于集体宗教仪式，其可以将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区分。首先，涂尔干虽然做出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但对集体欢腾的研究材料均来自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二手文献，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其次，该种研究方法适用于分析宏观社会趋势以及大规模群体层面的社会现象，但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和动机缺乏深度分析。再次，这种方法会产生主观性偏差，对于集体欢腾同一社会现象，不同评价者可能因个人经验、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结果差异较大。最后，该方法的研究结果是无法被检验的，因为其未设定统一且量化的客观标准，不同评价者可能采用不同参照，导致结果缺乏可重复性。

1.3.1 集体欢腾的新近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者将集体欢腾可操作化，编制了集体欢腾量表，使集体欢腾以量化的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例如，Gabriel 等人(2020)编制了 8 个题项的集体欢腾量表；Páez 等人(2015)将感知情感同步作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为集体欢腾的测量指标，编制了感知情感同步量表。因此，将集体欢腾和感知情感同步进行互换使用(Castro-Abril et al., 2021; Włodarczyk et al., 2023; Zabala et al., 2023)。Włodarczyk 等人 (2020)对 Páez 等人的量表做出修订，提出简化版的感知情感同步量表。

另外，目前有关集体欢腾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在实验条件下诱发集体欢腾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向被试解释集体欢腾，然后让其回忆一件集体欢腾的事件并花 2 分钟沉浸在集体欢腾体验中；随后，被试需列出与该事件相关的 4 个关键词，并用 3 分钟描写该事件；最后对集体欢腾进行操作性检验(Naidu et al., 2024)。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被试是否能够精准回忆过去；即使能够回忆过去，是否会如实报告；即使能够回忆并如实报告，选择、重构、简化等记忆偏差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甚至最后对被试的回忆内容进行人工编码也可能出现偏差，最终减低结果的可靠性。其二是把各种真实集体聚会环境中的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用量表测量，在运动节(Páez et al., 2015)、爱国游行(Włodarczyk et al., 2023)、节日庆典(Włodarczyk et al., 2020)、三八节(Zumeta et al., 2020)等现实生活集体聚会背景下有利于诱发集体欢腾高唤醒水平。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在集体聚会背景下，由于社会赞许效应，参与者的去个性化可能会导致规范性作答，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可能有利于减少自我报告产生的偏差。

一方面，部分研究者采用随机组设计，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被试要求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集体欢腾事件以唤醒集体欢腾，而控制组被试参与无关群

众事件/不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无关事件即可(Castro-Abril et al., 2021; Naidu et al., 2024), 最后对两组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例如, Gabriel 等人(2024)让实验组被试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 控制组则描述群体沉默的事件, 结果发现, 与控制组相比, 集体欢腾组的生命意义感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该研究方法简单易行, 通过随机分配原则减少不同组间的基线特征差异, 能够较好的平衡组间差异, 提高了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接受处理的总是不同的个体, 从根本上是不能排除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混淆的; 其次, 人为控制的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模拟真实生活, 结果的可推广性受限; 最后, 虽然能够揭示因果关系, 但无法对未来趋势进行动态预测。

另一方面, 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使用时间序列设计, 通过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天、周、月等)对同一批样本分别实施几次横断研究, 以比较相关的集体欢腾数据在测量时间上的差异。例如, Bouchat 等人(2020)在一个高度生态环境中探讨集体欢腾的短期和长期社会心理影响, 对参与大规模童子军聚会的参与者分别在三个时间点采集集体欢腾等相关数据: T1 (大型童子军聚会前 1-9 天)、T2 (参与聚会后 24h 内) 和 T3 (聚会后 10 周); 结果表明, 在集体聚会期间, 参与者集体欢腾唤醒水平越高, 其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越强, 且与非参与者相比, 参与者在 10 周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首先, 每次测量的都是同一批样本, 因此能够避免因不同时间点调查样本不一样而不可比的问题; 其次, 基于一定的研究假设, 可以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 从而考察集体欢腾不同的效应。不过, 一是该设计的数据采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常因为人口流动、失联等因素导致样本流失的问题; 二是虽然在分析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一定优势, 但仍然很难完全确定因果关系, 比如说无法排除社会变迁等其他变量对结果的影响; 三是对有限的样本进行施测, 结果可靠性受样本大小和代表性影响较大。

此外, 极少数研究采用的设计与横断序列设计类似, 即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批次被试进行 2 次相同测量的研究, 并比较 2 项研究的集体欢腾及相关数据的差异。例如, Zlobina 和 Dávila(2022)在研究 1 中对集体欢腾当天的参与者进行在线研究, 时隔聚会 8 个月对另一群集体聚会参与者进行第 2 次研究, 旨在测试第 1 次研究中集体欢腾产生影响的持久性, 两次研究的测量方法相同。就该研究设计而言, 首先, 在时间间隔 8 个月的两项研究中对同一假设模型进行重复验证, 有利于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和外部效度; 其次, 不同时间点上样本可以不一样, 因此获取数据相对容易; 再次, 能够研究一切可通过问卷调查测量的心理与行为, 适用范围广; 最后, 根据研究假设, 可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Yang & Land, 2008)。但是, 在不同时间点对不同研究样本进行施测, 样本是否具有

代表性、样本间是否具有可比较性并不能保证，以致于结果的可推广性以及可靠性受限，并不能合理预测集体欢腾的影响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

意见 3:

对“集体欢腾”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特别是其在世俗聚会中的内涵和产生条件，与 Durkheim 的原始定义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的阐述不够充分。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我们对集体欢腾概念进行界定，并增加实例辅助读者对集体欢腾内涵的理解。另外，我们对 Durkheim 集体仪式集体欢腾和世俗聚会集体欢腾在内涵和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做出了修改和完善，具体修改内容同上“1.1 内涵上的相异性、1.2 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

意见 4:

对集体欢腾的产生机制和社会心理效应的解释较为分散，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或模型来整合这些不同的观点。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以表的形式对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学效应及其解释机制进行了梳理，具体补充内容如下：

2.1.4 集体欢腾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小结

.....

表 1 列举了集体欢腾的一些代表性心理学实证研究，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所解决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理论解释。从实验设计来看，目前集体欢腾的实验研究多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提高了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从解释或理论来看，当前研究侧重于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解释集体欢腾对群体凝聚力的促进作用，从社会情感角度探讨集体欢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被广泛使用于解释集体欢腾的心理效应。

表 1 集体欢腾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的部分代表性研究列举

分类	首作(年份)	解决问题	研究设计	解释或理论
集体欢腾增强群体凝聚力	Páez(2015)	集体欢腾→社会融合、身份融合	集体欢腾组(参与运动节集体聚会)/对照组(参与无关群众聚会)	身份融合机制：集体欢腾状态有助于促进参与者产生身份融合，进一步增强凝聚力。
	Włodarczyk (2023)	集体欢腾→社会认同、身份融合、共同信念	前测(爱国游行聚会前 4 天)；中测(参与聚会当天)；后测(聚会后 4 天)	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强调群体注意力、动作、情感等多方面的同步体验有助于增强集体欢腾，进而加强凝聚力，社会认同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
	Włodarczyk (2020)	集体欢腾→社会认同	前测(节日庆典聚会前 4 天)；中测(参与聚会当天)；后测(聚会后 4 天)	
集体欢腾促进心理健康	Gabriel (2020)	集体欢腾→生活意义感、幸福感	集体欢腾组(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控制组(描述群体沉默的集体聚会事件)	情绪理论：集体活动中的密切协调动作向感知者暗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情绪，该情绪效果是基于集体欢腾产生的。
	Naidu(2024)	集体欢腾→心理健康	集体欢腾组(描写集体欢腾事件)/控制组(描写普通事件)	集体聚会中群体通过同步动作唤醒集体欢腾，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Zumeta (2020)	集体欢腾→自我超越情感	集体欢腾组(参与三八节聚会活动)/控制组(关注三八节聚会活动)	
集体欢腾的持久性积极效应	Zabala (2023)	集体欢腾→社会融合、社会接纳、社会实现	纵向研究： T1(体育节聚会前 3 周)、T2(参与聚会后 1 周内)和 T3(聚会后 6-7 周)	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参与聚会引发的集体欢腾在社会心理效应中起着核心作用，集体欢腾的积极心理效应在时间上具有潜在的长期持续性影响。
	Bouchat (2020)	集体欢腾→群体认同、身份融合、自尊、幸福感	纵向研究： 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 1-9 天)、T2(参与聚会后 24h 内)和 T3(聚会后 10 周)	

Bouchat (2024)	集体欢腾→自尊、积极情绪	纵向研究: T1(集体聚会前)、T2(参与聚会后 24 小时内)和 T3(聚会后 10 周)
Zlobina (2022)	集体欢腾→道德责任感、社会规范	横向重复研究: 研究 1(参与聚会当天)、研究 2(参与聚会后 8 个月)

意见 5:

对研究方法的描述过于笼统，缺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详细解释和论证。例如，对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的分析不足，缺乏对研究设计中可能存在的偏差的讨论。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对研究方法部分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具体补充内容如下：

1.3 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

1.3.1 集体欢腾的传统研究方法

早期学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集体欢腾进行探索，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和环境的不可控性，很难采取纯粹的实验方法。因此，社会学家只能比较两个较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将两者间的共性作为控制变量，将异性做比较，从而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Durkheim 主要采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即把两个以上的民族进行对照研究。例如，Durkheim(1912)选取的研究对象来源于两个原始部落——澳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通过对这两个部落的比较研究发现集体欢腾起源于集体宗教仪式，其可以将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区分。首先，涂尔干虽然做出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但对集体欢腾的研究材料均来自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二手文献，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其次，该种研究方法适用于分析宏观社会趋势以及大规模群体层面的社会现象，但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和动机缺乏深度分析。再次，这种方法会产生主观性偏差，对于集体欢腾同一社会现象，不同评价者可能因个人经验、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结果差异较大。最后，该方法的研究结果是无法被检验的，因为其未设定统一且量化的客观标准，不同评价者可能采用不同参照，导致结果缺乏可重复性。

1.3.1 集体欢腾的新近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者将集体欢腾可操作化，编制了集体欢腾量表，使集体欢腾以量化的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例如，Gabriel 等人(2020)编制了 8 个题项的集体欢腾量表；Páez 等人(2015)将感知情感同步作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为集体欢腾的测量指标，编制了感知情感同步量表。因此，将集体欢腾和感知情感同步进行互换使用(Castro-Abril et al., 2021; Włodarczyk et al., 2023; Zabala et al., 2023)。

另外，目前有关集体欢腾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在实验条件下诱发集体欢腾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向被试解释集体欢腾，然后让其回忆一件集体欢腾的事件并花 2 分钟沉浸

在集体欢腾体验中；随后，被试需列出与该事件相关的 4 个关键词，并用 3 分钟描写该事件；最后对集体欢腾进行操作性检验(Naidu et al., 2024)。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被试是否能够精准回忆过去；即使能够回忆过去，是否会如实报告；即使能够回忆并如实报告，选择、重构、简化等记忆偏差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甚至最后对被试的回忆内容进行人工编码也可能出现偏差，最终减低结果的可靠性。其二是把各种真实集体聚会环境中的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用量表测量，在运动节(Páez et al., 2015)、爱国游行(Wlodarczyk et al., 2023)、节日庆典(Wlodarczyk et al., 2020)、三八节(Zumeta et al., 2020)等现实生活集体聚会背景下有利于诱发集体欢腾高唤醒水平。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在集体聚会背景下，由于社会赞许效应，参与者的去个性化可能会导致规范性作答，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可能有利于减少自我报告产生的偏差。

一方面，部分研究者采用随机组设计，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被试要求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集体欢腾事件以唤醒集体欢腾，而控制组被试参与无关群众事件/不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无关事件即可(Castro-Abril et al., 2021; Naidu et al., 2024)，最后对两组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例如，Gabriel 等人(2024)让实验组被试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控制组则描述群体沉默的事件，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集体欢腾组的生命意义感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该研究方法简单易行，通过随机分配原则减少不同组间的基线特征差异，能够较好的平衡组间差异，提高了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接受处理的总是不同的个体，从根本上是不能排除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混淆的；其次，人为控制的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模拟真实生活，结果的可推广性受限；最后，虽然能够揭示因果关系，但无法对未来趋势进行动态预测。

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使用时间序列设计，通过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天、周、月等)对同一批样本分别实施几次横断研究，以比较相关的集体欢腾数据在测量时间上的差异。例如，Bouchat 等人(2020)在一个高度生态环境中探讨集体欢腾的短期和长期社会心理影响，对参与大规模童子军聚会的参与者分别在三个时间点采集集体欢腾等相关数据：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 1-9 天）、T2（参与聚会后 24h 内）和 T3（聚会后 10 周）；结果表明，在集体聚会期间，参与者集体欢腾唤醒水平越高，其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越强，且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者在 10 周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首先，每次测量的都是同一批样本，因此能够避免因不同时间点调查样本不一样而不可比的问题；其次，基于一定的研究假设，可以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从而考察集体欢腾不同的效应。不过，一是该设计的数据采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常因为人口流动、失

联等因素导致样本流失的问题；二是虽然在分析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一定优势，但仍然很难完全确定因果关系，比如说无法排除社会变迁等其他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三是对有限的样本进行施测，结果可靠性受样本大小和代表性影响较大。

此外，极少数研究采用的设计与横断序列设计类似，即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批次被试进行 2 次相同测量的研究，并比较 2 项研究的集体欢腾及相关数据的差异。例如，Zlobina 和 Dávila(2022)在研究 1 中对集体欢腾当天的参与者进行在线研究，时隔聚会 8 个月对另一群集体聚会参与者进行第 2 次研究，旨在测试第 1 次研究中集体欢腾产生影响的持久性，两次研究的测量方法相同。就该研究设计而言，首先，在时间间隔 8 个月的两项研究中对同一假设模型进行重复验证，有利于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和外部效度；其次，不同时间点上样本可以不一样，因此获取数据相对容易；再次，能够研究一切可通过问卷调查测量的心理与行为，适用范围广；最后，根据研究假设，可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Yang & Land, 2008)。但是，在不同时间点对不同研究样本进行施测，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间是否具有可比较性并不能保证，以致于结果的可推广性以及可靠性受限，并不能合理预测集体欢腾的影响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

意见 6:

论文主要依赖于对已有文献的综述和分析，缺乏对原始数据的分析和解读。如果要提出新的研究结论，就需要有基于原始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来支撑。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我们十分赞同您的意见“新的研究结论需要基于有原始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来支撑”，其在文中的体现有“参与集体聚会后在心理社会层面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这一系列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已有的研究表明，集体欢腾的积极影响少则可以持续 1 至 4 周(Khan et al., 2016; Páez et al., 2015)，多则长达 10 周(Bouchat et al., 2020)，甚至是 8 个月(Zlobina & Dávila, 2022)。”，又如“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使用时间序列设计，通过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天、周、月等)对同一批样本分别实施几次横断研究，以比较相关的集体欢腾数据在测量时间上的差异。例如，Bouchat 等人(2020)在一个高度生态环境中探讨集体欢腾的短期和长期社会心理影响，对参与大规模童子军聚会的参与者分别在三个时间点采集集体欢腾等相关数据：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 1-9 天）、T2（参与聚会后 24h 内）和 T3（聚会后 10 周）；结果表明，在集体聚会期间，参与者集体欢腾唤醒水平越高，其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越强，且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者在 10 周后表现……”。

意见 7:

论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不够深入，未能充分揭示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

回应：感谢您的指导。本文对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的分析不够充分和深入。根据

您的意见，我们对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的多维度性进行了补充。具体补充内容如下：

2.1.4 集体欢腾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小结

从前文提到集体欢腾的积极效应及其解释机制可以反映出，集体欢腾积极效应具有多维度性特征。基于已有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本研究从认知维度、情感维度、时间维度 3 各方面探讨了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学效应的多维度性。

首先，有研究表明，集体欢腾不仅具有促进身份融合、社会认同的作用，还可以增强集体自尊、集体信念和凝聚力(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3)。在集体欢腾中，个体更加认同自己所属的群体，个人与集体自我发生重叠，进而感受到更强的群体凝聚力。集体欢腾在社会认同、群体凝聚力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可以归纳为认知维度。

其次，集体欢腾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如兴奋、激动、自豪等。这些情感在集体中相互传递和放大并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共同经历集体欢腾在增强幸福感(Gabriel et al., 2020)和自我效能感(Zumeta et al., 2016)、降低孤独感(Bouchat et al., 2024)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集体欢腾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影响可以归纳为情感维度。

最后，集体欢腾在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积极心理效应在时间上具有持久性，其不仅在世俗的集体聚会期间存在，而且聚会结束后仍然持续在个体之间传递和延续。研究表明，集体欢腾的积极影响少则可以持续 1-4 周(Khan et al., 2016; Páez et al., 2015)，多则长达 8 个月(Zlobina & Dávila, 2022)。集体欢腾作为一种跨时间的持久现象，不仅在集体聚会期间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在聚会结束后仍然通过情感渲染、集体记忆持续存在。例如，春节集体欢腾活动在每年的重复中不断强化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使得集体欢腾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集体参与行为。

意见 8:

逻辑结构不够清晰，论证过程不够严谨，部分论点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并结合另外两位专家的意见，我们修改了文章的逻辑结构：不要引用，直接从集体欢腾这一现象的概念出发层层递进式地论证，并将“集体欢腾变迁”修改为“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的区分”，然后再分小节分别阐述其在“内涵上的相异性”、“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另外，我们已通篇阅读全文，对论点及其表述不严谨的地方进行重新梳理，具体修改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注。

意见 9:

部分语句表达不够精准，存在逻辑混乱或语义不明确的情况。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我们已逐句阅读全文，并对语句表达、逻辑混乱等问题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例如“集体欢腾巩固并加强了个体间的联结，其是一个产生社会团结的过程(Dimond et al., 2015)。集体聚会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而该结果可以归结于集体欢腾在其中的影响机制。有研究考察了集体欢腾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集体欢腾有助于增强集体自尊以及集体信念、促进社会凝聚力(Wlodarczyk et al., 2023)。即使在群体凝聚力减弱的情境下，集体欢腾也能够重塑个体间的凝聚力(Pelletier, 2018)。”、“参与集体聚会激发了集体欢腾，从而促进自我超越情感，且在女性群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Zumeta et al., 2020)。后来 Wlodarczyk 等人(2023)也发现集体欢腾能够增加自我超越情感的相同结论”、“然而，本文通过整理文献发现，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并非仅限于短期影响，其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即便在实验情境中诱发被试的集体欢腾作用结束后，其仍然受益于集体欢腾效应”……

回应审稿专家二意见：

这篇综述关注了一个发源于社会学的概念（集体欢腾）在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中的概念内涵差异和社会心理效应。这个主题总体上比较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前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综述，因此有发表潜力，但文章需要大幅改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意见 1：

心理学领域的社会变迁研究一般需要比较扎实的实证量化数据作为证据支撑。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集体欢腾”的概念内涵、产生条件、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变迁”，主要是基于文献梳理和主观判断。作为综述论文，其结论当然可以主要基于文献分析，但一般而言心理学对“变迁”的结论还是需要量化数据。建议调整“变迁”这个术语，谨慎改用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因为“变迁”在近十多年的心理学研究中已经有比较固定的内涵和方法论要求（见《心理学报》2024 年的社会变迁专刊），此处将文献综述结果视为“变迁”证据是不妥的。况且，概念内涵、产生条件、研究方法在时间上的差异可能只是领域间的“差异”（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差异），未必是真正的“变化”，只是恰巧社会学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和研究方法，而心理学后提出了操作定义和量化方法，两者属于平行关系，未必属于集体欢腾概念本身的实质性“变迁”。这种差异既无法反映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内部各自对这个概念理解的纵向变化，也无法反映公众头脑中的概念变迁。总之，本文所论断的“变迁”是不妥的，有偷换概念之嫌。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肯定和指导。我们十分赞同您的观点“心理学对变迁的结论需要量化数据支撑，将文献综述结果视为变迁证据是不妥的”。根据您的意见，我们结合意见 2、意见 4、意见 5，把涂尔干视角下的集体欢腾与心理学视野下的集体欢腾在内涵、产生条件、研究方法上进行区别，探讨其差异性。因此，我们将“集体欢腾变迁”修改为“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的区分”，然后再分小节分别阐述其在“内涵上的相异性”、“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 涂尔干与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的区分

1.1 内涵上的相异性

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个人情绪会因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集体欢腾是在大

型集体活动中，如阅兵典礼、音乐会、体育比赛或民族节日上，你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同步化。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个时刻，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刻，可能是观众在欣赏一些美妙音乐的时刻，可能是中华民族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亦可能是在你的团队进球后的时刻。这是一群甚至可能不认识彼此的人共同进行同样的事所带来的一种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集体欢腾由涂尔干于 1912 年正式提出，近 100 多年以来，经 Moscovici、Páez 等人在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基础上的扩展，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参与宗教仪式活动以及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正在下降(Twenge et al., 2016)。现代人很难从原始的集体宗教仪式中体验集体欢腾，也更难通过集体欢腾解决不同群体间的凝聚力。因此，集体欢腾的内涵演变也随之经历了从集体仪式到世俗的集体聚会的转变。起初，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把集体欢腾理解为一种神圣感，其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情境中被唤醒。如今，在现代社会中集体欢腾已被世俗化，即使在普遍的日常聚会中，集体欢腾也常常发生。集体欢腾的概念具有两个意义上的流变，第一为去神圣化（即世俗化）、第二为去仪式化。

集体欢腾是个体在参与集体仪式活动时发生的个人情绪同步和强化的过程(涂尔干, 1999)。涂尔干最初创造集体欢腾是为了描述集体宗教仪式活动产生的情感效果，即原始人的日常生活是很平静的，而在集体仪式中却很兴奋、冲动和情绪激昂，并将其归为是“神”的力量所致。在传统社会背景下，涂尔干过于强调宗教集体仪式，认为集体欢腾仅存在于集体仪式情境，唤醒集体欢腾要求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通过重复执行具有刻板性、象征性和强迫性的相同序列动作，使得自我与他人发生重叠，进而产生一种神圣感和自我超越感。在宗教集体仪式下，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欢腾进入到神圣世界，可以感受到世俗生活中体验不到的神圣感和仪式感，其可以把神圣与世俗分开。

从变迁的角度看，宗教集体仪式主要流行于传统社会，而世俗聚会则主要流行于当下的现代社会。因此，世界范围内集体欢腾也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世俗聚会的变化：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较为多见，宗教仪式下的集体欢腾不断式微。心理学研究者认为集体欢腾并不只存在于集体仪式中，在世俗聚会中也常常发生，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有研究发现在世俗聚会中有 3/4 的被试每周至少体验 1 次集体欢腾，1/3 的被试每天都经历 1 次集体欢腾(Gabriel et al., 2020)。集体欢腾的核心要素除了神圣感外，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普遍的联结感(Gabriel et al., 2017)和团结感(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3)。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少，不需要特定的

时间和空间，在音乐会、电影院、广场舞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世俗聚会情境中的集体欢腾具有世俗化、去仪式化特征，其并不是把神圣和世俗分开，而是把日常的世俗变得有意义和神圣(Gabriel et al., 2020)。

此外，涂尔干(1999)认为集体欢腾与所涉及的情绪类型无关，不管任何情绪，关键在于被分享。但有学者认为集体欢腾除了需要被分享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情绪成分的融合和情绪同步。Rimé 和 Páez(2023)提出，集体欢腾是指集体聚会的参与者由于体验到共享情绪而表现出的明显高涨的共享情绪状态，其既涉及常规情绪(如喜悦、悲伤)，也涉及更复杂的情绪状态(如敬畏、集体自豪感)，并强调这些不同类型的情绪成分的融合，以产生情绪的同步化，从而到达高唤醒水平的集体欢腾。

1.2 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

集体聚会期间的情绪体验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其中一些变量是激活集体欢腾不可或缺的标准(Collins, 2014)。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相较于集体仪式集体欢腾，世俗聚会集体欢腾产生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已发生改变，当前集体欢腾激活要素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角度可以分别归纳为共享注意力、共享情绪和动作协调。

涂尔干(1999)早期提出，集体欢腾的产生条件有二：其一是注意力集中，即参与者需要有共同的注意力焦点；其二是情绪和行为表达的同步，即参与者在动作、手势等方面的同步。他认为一个群体同步他们的集体行为和注意力之后，将促进他们彼此的情绪同步，共享的情绪状态因个体间的相互强化而变得更加强烈。

随后，Wlodarczyk、Pizarro 等人在涂尔干的基础上，发展了集体欢腾新的产生要素。Wlodarczyk 等人(2020)认为集体聚会中集体欢腾的唤醒需要满足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人们聚集同一个场所，并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存在与互动(Collins, 2004)，原因是高人群密度会强化和预测集体欢腾(Liebst et al., 2019)；二是注意力同步，即有共同关注的焦点(Rennung & Göritz, 2016)；三是在特定的集体聚会中个体间的有意协调。(Gabriel et al., 2017; Rennung & Göritz, 2016)。以上三个条件促进了集体欢腾的出现。

此外，Pizarro 等人(2022)认为集体欢腾的激活需要满足 3 个条件：其一，群体成员间的注意力同步；其二，群体成员间在行为层面趋于一致；其三，最重要的是群体成员间共享情绪。这三个条件的满足有助于个体的情绪体检得到强化并产生认知上的变化，群体意识战胜个人意识，从而唤醒集体欢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集体欢腾的被激活的核心要素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已发生改变。从认知和情感角度出发，不管是从注意力集中到共享注意力，还是从情绪同步

到共享情绪，参与者在认知和情感上发生了个人到群体的转变，强调注意力和情绪并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体验，而是通过共享被整个群体所感知，群体成员间需要达到一种集体层面的共享状态。另外，从行为角度看，动作同步已演变为动作协调，这暗示集体欢腾的激活情景并不仅限于集体仪式，其普遍存在于世俗的集体聚会中。涂尔干认为动作同步是集体仪式中激活集体欢腾的必要条件。集体仪式中的动作同步是重复执行严格规定的相同序列动作，具有刻板性、强迫性和象征性(薛秋, 尹可丽, 2023)，而动作协调不具有以上特征，强调人际互动性，参与者的动作不再是伴随仪式化的序列动作。

1.3 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

1.3.1 集体欢腾的传统研究方法

早期学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集体欢腾进行探索，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和环境的不可控性，很难采取纯粹的实验方法。因此，社会学家只能比较两个较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将两者间的共性作为控制变量，将异性做比较，从而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涂尔干主要采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即把两个以上的民族进行对照研究。例如，涂尔干(1999)选取的研究对象来源于两个原始部落——澳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通过对这两个部落的比较研究发现集体欢腾起源于集体宗教仪式，其可以将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区分。首先，涂尔干虽然做出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但对集体欢腾的研究材料均来自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二手文献，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其次，该种研究方法适用于分析宏观社会趋势以及大规模群体层面的社会现象，但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和动机缺乏深度分析。再次，这种方法会产生主观性偏差，对于集体欢腾同一社会现象，不同评价者可能因个人经验、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结果差异较大。最后，该方法的研究结果是无法被检验的，因为其未设定统一且量化的客观标准，不同评价者可能采用不同参照，导致结果缺乏可重复性。

1.3.1 集体欢腾的新近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者将集体欢腾可操作化，编制了集体欢腾量表，使集体欢腾以量化的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例如，Gabriel 等人(2020)编制了 8 个题项的集体欢腾量表；Páez 等人(2015)将感知情感同步作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为集体欢腾的测量指标，编制了感知情感同步量表。因此，将集体欢腾和感知情感同步进行互换使用(Castro-Abril et al., 2021; Włodarczyk et al., 2023; Zabala et al., 2023)。Włodarczyk 等人 (2020)对 Páez 等人的量表做出修订，提出简化版的感知情感同步量表。

另外，目前有关集体欢腾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在实验条件下诱发集体欢腾的方法有两

种。其一是通过向被试解释集体欢腾，然后让其回忆一件集体欢腾的事件并花 2 分钟沉浸在集体欢腾体验中；随后，被试需列出与该事件相关的 4 个关键词，并用 3 分钟描写该事件；最后对集体欢腾进行操作性检验(Naidu et al., 2024)。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被试是否能够精准回忆过去；即使能够回忆过去，是否会如实报告；即使能够回忆并如实报告，选择、重构、简化等记忆偏差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甚至最后对被试的回忆内容进行人工编码也可能出现偏差，最终减低结果的可靠性。其二是把各种真实集体聚会环境中的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用量表测量，在运动节(Páez et al., 2015)、爱国游行(Wlodarczyk et al., 2023)、节日庆典(Wlodarczyk et al., 2020)、三八节(Zumeta et al., 2020)等现实生活集体聚会背景下有利于诱发集体欢腾高唤醒水平。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在集体聚会背景下，由于社会赞许效应，参与者的去个性化可能会导致规范性作答，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可能有利于减少自我报告产生的偏差。

一方面，部分研究者采用随机组设计，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被试要求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集体欢腾事件以唤醒集体欢腾，而控制组被试参与无关群众事件/不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无关事件即可(Castro-Abril et al., 2021; Naidu et al., 2024)，最后对两组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例如，Gabriel 等人(2024)让实验组被试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控制组则描述群体沉默的事件，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集体欢腾组的生命意义感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该研究方法简单易行，通过随机分配原则减少不同组间的基线特征差异，能够较好的平衡组间差异，提高了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接受处理的总是不同的个体，从根本上是不能排除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混淆的；其次，人为控制的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模拟真实生活，结果的可推广性受限；最后，虽然能够揭示因果关系，但无法对未来趋势进行动态预测。

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使用时间序列设计，通过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天、周、月等)对同一批样本分别实施几次横断研究，以比较相关的集体欢腾数据在测量时间上的差异。例如，Bouchat 等人(2020)在一个高度生态环境中探讨集体欢腾的短期和长期社会心理影响，对参与大规模童子军聚会的参与者分别在三个时间点采集集体欢腾等相关数据：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 1-9 天）、T2（参与聚会后 24h 内）和 T3（聚会后 10 周）；结果表明，在集体聚会期间，参与者集体欢腾唤醒水平越高，其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越强，且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者在 10 周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首先，每次测量的都是同一批样本，因此能够避免因不同时间点调查样本不一样而不可比的问题；其次，基于一定的研究假设，可以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从而考察集体

欢腾不同的效应。不过，一是该设计的数据采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常因为人口流动、失联等因素导致样本流失的问题；二是虽然在分析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一定优势，但仍然很难完全确定因果关系，比如说无法排除社会变迁等其他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三是对有限的样本进行施测，结果可靠性受样本大小和代表性影响较大。

此外，极少数研究采用的设计与横断序列设计类似，即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批次被试进行 2 次相同测量的研究，并比较 2 项研究的集体欢腾及相关数据的差异。例如，Zlobina 和 Dávila(2022)在研究 1 中对集体欢腾当天的参与者进行在线研究，时隔聚会 8 个月对另一群集体聚会参与者进行第 2 次研究，旨在测试第 1 次研究中集体欢腾产生影响的持久性，两次研究的测量方法相同。就该研究设计而言，首先，在时间间隔 8 个月的两项研究中对同一假设模型进行重复验证，有利于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和外部效度；其次，不同时间点上样本可以不一样，因此获取数据相对容易；再次，能够研究一切可通过问卷调查测量的心理与行为，适用范围广；最后，根据研究假设，可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Yang & Land, 2008)。但是，在不同时间点对不同研究样本进行施测，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间是否具有可比较性并不能保证，以致于结果的可推广性以及可靠性受限，并不能合理预测集体欢腾的影响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

意见 2:

所谓“基于社会变迁背景，心理学视野下的集体欢腾已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变迁”、“随着社会的变迁，集体欢腾的内涵、产生条件和研究方法已发生流变”——这类论述不严谨。某个概念的变迁未必与“社会变迁”有关，“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变迁”也不一定是社会变迁。集体欢腾的各方面“变迁”是否在逻辑上“基于社会变迁背景”或“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待实证检验。否则，任何变化都可以套上社会变迁的外壳，那么这个外壳就没有意义了。结合意见 1，集体欢腾的所谓“变迁”并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而只是两个领域的方法论差异，是从社会学视野变成了心理学视野，而不是心理学视野内部的集体欢腾发生了变化。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具体修改内容同意意见 1。

意见 3:

同上，引言第二段“这使得”的论断也需要证据支撑，为什么是流变导致了心理效应的增加？如果只是主观推测，则不能用类似因果性表述。类似问题还有“集体欢腾能够使人们随着时代变迁迅速融入群体并建立社会联结”。

回应：感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通读全文，对类似上述表述不严谨、用语不精准的句子进行了修改和纠正。

意见 4:

2.2 部分关于“产生条件的变迁”，实际上只是不同学者的观点差异而已，属于百家争鸣，并非“变迁”，因此不能就此论断“产生条件”发生了变化——你如何证明是产生条件确实发生了变化，还是学者头脑中认为的产生条件发生了变化？目前来看只是后者，所以需要更严谨的措辞，避免概念混淆。

回应：多谢您的提醒。我们对您的上述观点表述十分赞同，具体做出的修改内容同意意见 1。

意见 5:

2.3 部分关于“研究方法的变迁”，很显然也只是社会学与心理学范式的横向差异，而不是纵向变迁。请参考意见（1）（2）（4）修改。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具体修改内容同意意见 1。

意见 6:

如何区分“集体行动”和“集体欢腾”，理解两个概念的异同和关系？此外，由于集体欢腾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建议文章在语言上更具通俗性与科普性，还可以增加更多实例辅助理解这个概念的内涵。

回应：多谢您的提醒。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个人情绪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在心理学中，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通常被定义为个人作为群体的代表所采取的协同性行动(Van Zomeren & Iyer, 2009; Wright et al., 1990)。两者均出现于集体聚会情境下，集体行动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是集体欢腾产生的基础。Durkheim(1912)提出，集体欢腾本身是建立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之上的，一旦人们集中到一起，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电的激流就迅速使人们达到极度亢奋的集体欢腾的状态。Collins(2004)以及 Páez 等人(2015)均认为集体聚会中的同步行动促进了集体欢腾的形成。另外，高唤醒水平的集体欢腾也会进一步强化集体行动，促进群体的亲社会行为。有实证研究表明，集体活动中的同步动作会改变个体的情感体验，唤醒集体欢腾，从而促进亲群体行为和社会联结(Zabala et al., 2024; 薛秋, 尹可丽, 2024)。

另外，根据您的意见，我们补充了一些实例以增加读者对集体欢腾的理解。例如：

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个人情绪会因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集体欢腾是在大型集体活动中，如阅兵典礼、音乐会、体育比赛或民族节日上，你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同步化。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个时刻，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刻，可能是观众在欣赏一些美妙音乐的时刻，可能是中华民族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亦可能是奥运会运动员夺冠的时刻。这是一群甚至可能不认识彼此的人共同进行同样的事所带来的一种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便以部族、村落等方式群居，除了与宗教信仰关联的集体仪式外，还创造了许多世俗中集体参与的集体欢腾活动。例如：中国各民族的民间集体传统节

日中，常见集体欢腾现象。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人人手持火把，齐步奔走，最后将手中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巨大的篝火，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在载歌载舞中集体狂欢。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傣族的泼水节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亦是民间集体欢腾的体现。个人的情感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强烈的集体情感，收获一种与有荣焉的幸福感。

.....

新增参考文献列表：

薛秋, 尹可丽.(2024). 同步动作对社会联结的影响:集体欢腾的中介作用和团队规模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56(12), 1821–1835.

Páez, D., Rimé, B., Basabe, N., Wlodarczyk, A., & Zumeta, L. (2015).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5), 711–729.

Van Zomeren, M., & Iyer, A. (2009). Toward integr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645–660.

Wlodarczyk, A., Zumeta, L., Pizarro, J. J., Bouchat, P., Hatibovic, F., Basabe, N., & Rimé, B. (2020).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Validation of a short scale and proposition of an integrative meas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1721.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6), 994–1003.

意见 7：

建议用图表梳理和呈现本文的关键内容。目前文章没有任何图表，读来比较枯燥。

回应：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以表的形式对文章内容进行了梳理，具体补充内容如下：

2.1.4 集体欢腾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小结

表 1 列举了集体欢腾的一些代表性心理学实证研究，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所解决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理论解释。从实验设计来看，目前集体欢腾的实验研究多采用准纵向研究设计，提高了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从解释或理论来看，当前研究侧重于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解释集体欢腾对群体凝聚力的促进作用，从社会情感角度探讨集体欢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被广泛使用于解释集体欢腾的心理效应。

表 2 集体欢腾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的部分代表性研究列举

分类	首作(年份)	解决问题	研究设计	解释或理论
集体欢腾增强群体凝聚力	Páez(2015)	集体欢腾→社会融合、身份融合	集体欢腾组(参与运动节集体聚会)/对照组(参与无关群众聚会)	身份融合机制：集体欢腾状态有助于促进参与者产生身份融合，进一步增强凝聚力。
	Wlodarczyk(2023)	集体欢腾→社会认同、身份融合、共同信念	前测(爱国游行聚会前 4 天)；中测(参与聚会当天)；后测(聚会后 4 天)	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强调群体注意力、动作、情感等多方面的同步体验有助于增强集体欢腾，进而加强凝聚力，社会认同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
	Wlodarczyk(2020)	集体欢腾→社会认同	前测(节日庆典聚会前 4 天)；中测(参与聚会当天)；后测(聚会后 4 天)	
促进心理健康	Gabriel(2020)	集体欢腾→生活意义感、幸福感	集体欢腾组(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控制组(描述群体沉默的集体聚会事件)	情绪理论：集体活动中的密切协调动作向感知者暗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情绪，该情绪效果是基

集体欢腾积极效应的持久性	Naidu(2024)	集体欢腾→心理健康	集体欢腾组(描写集体欢腾事件)/控制组(描写普通事件)	于集体欢腾产生的。集体聚会中群体通过同步动作唤醒集体欢腾，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Zumeta(2020)	集体欢腾→自我超越情感	集体欢腾组(参与三八节聚会活动)/控制组(关注三八节聚会活动)	
	Zabala(2023)	集体欢腾→社会融合、社会接纳、社会实现	纵向研究：T1(体育节聚会前3周)、T2(参与聚会后1周内)和T3(聚会后6-7周)	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参与聚会引发的集体欢腾在社会心理效应中起着核心作用，集体欢腾的积极心理效应在时间上具有潜在的长期持续性影响。
	Bouchat(2020)	集体欢腾→群体认同、身份融合、自尊、幸福感	纵向研究：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1-9天)、T2(参与聚会后24h内)和T3(聚会后10周)	
	Bouchat(2024)	集体欢腾→自尊、积极情绪	纵向研究：T1(集体聚会前)、T2(参与聚会后24小时内)和T3(聚会后10周)	
	Zlobina(2022)	集体欢腾→道德责任感、社会规范	横向重复研究：研究1(参与聚会当天)、研究2(参与聚会后8个月)	

意见 8:

最后一部分“问题与展望”过于简单、戛然而止。建议参考《心理科学进展》上的综述文章，一篇好的综述应有作者充分的独到观点和分析讨论。同时，建议最后补充一小段结语。

回应：感谢您的提醒。我们已对“问题与展望”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在文章最后补充了“5 结语”。具体修改和补充内容如下：

3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集体欢腾的流变及其社会心理效应加深了我们对集体欢腾现象的理解，但该领域还有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1 探究集体欢腾的消极影响

Durkheim 强调集体欢腾包括暴力、无节制、不受约束成分，其会导致反规范行为。王斌(2015)也认为，集体欢腾具有整合性和狂暴性特征。集体欢腾既是维系道德和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纽带，又是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然而，当前集中关注于集体欢腾的积极效应，少有实证研究探讨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

在 Durkheim 时代，人们往往把集体欢腾与极端行为联系起来。集体欢腾状态会导致个体失去自我意识和推断能力，因而易出现反社会的极端行为(Moscovici, 1993)。该观点得到去个性化理论的支持，即在集体情境中的匿名、大规模的群体和自我意识降低等因素会导致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Diener, 1979)。然而，社会认同模型指出，去个性化会促进亲社会行为，防止社会动乱，并有助于防止儿童偏见的发展(Vilanova, 2017)。此外，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集体欢腾过程中的群体行为并非是不受限制的，即使在自我意识降低的情况下，个体是受所在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支配并根据群体规范行事(Drury et al., 2020; Stott et al., 2018)。由此看来，当代的研究证据与传统社会的群体行为表现相违背。另外，100 多年前的集体欢腾文献资料与当今研究资料存在差异。前人在探讨集体欢腾现象时完全依赖于宗教集体仪式；相比之下，今天的体育比赛、音乐活动等世俗集体欢腾活动随处可见。虽然

在大规模的集体事件中可能偶尔会出现极端的表现，但绝大多数的集体聚会未发生暴力和破坏性行为。鉴于集体欢腾的复杂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可以对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

3.2 探索线上集体欢腾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欢腾的参与形式已发生变化。在互联网社会，网民参与的互联网集体行动日渐增多，集体欢腾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线上集体欢腾随处可见，如热播的电视剧、热搜榜事件等引发网民狂热的转发、跟贴和评论。又如追星粉丝聚集在一起自发形成的文娱社群——“饭圈”热潮。一方面，她们因共同的偶像参与线上获奖庆祝活动、组织线上应援活动，这些集体行动和互动能够放大和强化粉丝群体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形成一种强烈的集体情绪共鸣，从而增强粉丝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线上集体欢腾也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饭圈文化中引起的集体欢腾过度狂热也会导致不理智的行为，如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

线上集体欢腾可能具有双重影响，既要充分发挥它的凝聚力功能，又要预防其可能带来的网络社会秩序乱象。集体欢腾的参与形式从以往的线下转变为线上，这两者之间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影响有何异同？未来研究需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索线上集体欢腾现象，进一步揭示线上集体欢腾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比较线下与线上集体欢腾的差异。

3.3 揭示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

前文提到，集体欢腾在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但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影响并非对所有的研究变量都有效。例如，集体欢腾对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可以维持至少 10 周(Bouchat et al., 2020)。但在感知社会规范上并未产生持续性影响(Zlobina & Dávila, 2022)。集体欢腾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效果可能因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其中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制约(Fischer & Karl, 2020)。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中国本土化的集体欢腾现象对社会规定的影响。

另外，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可能通过集体记忆机制产生持续性影响。情绪可以构建集体记忆，从而塑造社会身份(Pace & Bilgic, 2018)。不同的情绪能够通过强化集体记忆发挥各自特定的社会功能(Beristáin et al., 2000)。这提示集体欢腾作为一种积极的集体情绪，可能通过强化集体记忆在时间上产生持续的积极效应。例如在“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中，集体欢腾通过升旗仪式、历史影像等文化符号激活并强化青年的爱国记忆、传承集体记忆，能够持续增强青年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揭示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影响背后的解释机制。

3.4 厘清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理论的局限性

集体欢腾理论是在 100 多年前的传统社会背景下，涂尔干通过对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二手资料进行推理和论证后提出的，其并不能对现代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首先，前文提到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用来描述宗教仪式所产生的情感效果，并仅存在于集体仪式。集体欢腾在伴随重复刻板的仪式化和象征性的序列动作过程中产生，使其具有神圣化和仪式感特征。但有研究发现，集体欢腾普遍出现于世俗聚会，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Gabriel et al., 2020)。这说明集体欢腾理论过度强调宗教仪式下的神圣世界，而忽略了世俗世界中集体欢腾的普遍性和世俗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普遍存在于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现象。

另外，前文提到，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积极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但集体欢腾理论强调集体欢腾对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是极其短暂的，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个体需要每周定时重复参与宗教仪式。此外，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会因其狂暴性特征而引发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但目前对集体欢腾的描述以及产生的结果影响都是正面性的，而对于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并无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遗留的问题都说明了集体欢腾理论在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的解释力上仍有局限。

4 结语

总体而言，从变迁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集体欢腾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世俗聚会的变化：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较为多见，宗教仪式下的集体欢腾不断式微。心理学视野下，世俗聚会集体欢腾在内涵、产生条件、研究方法上与涂尔干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相异，且现代人从世俗聚会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积极社会心理效应及其跨时间的持久性影响。这也反过来解释了集体欢腾现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和保留性。本文探究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的理论机制，不仅有利于理解人类社会自身文明的发展与进程，更是将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使之得以继续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课题。

意见 9:

“Durkheim”和“涂尔干”，有时用英文，有时用中文，请保持一致。“集体欢腾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英文术语建议在正文首次提出时写出，而不是在中间某个位置。

回应：多谢您的提醒。我们已在全文中统一使用中文“涂尔干”。另外，“集体欢腾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英文术语已放在正文首次提出时呈现。

意见 10:

摘要最后一句可以删除“等方向”，使语言更简洁易读。一些句子有语病，比如“集体欢腾状态下有助于促进参与者产生身份融合”，缺少主语，应删除“下”。类似缺主语的语病包括：“不管集体欢腾发生在任何类型的集体聚会(如民俗节日、庆祝仪式)中均可以激活身份融合”。其他语病请自行检查。

回应：多谢您的提醒。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逐句阅读了全文，对上述病句以及其他表达不顺畅、不精确的语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回应审稿专家三意见:

这篇综述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集体欢腾这一社会心理现象的概念、变迁、心理机制及其影响等，对读者理解这一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的写作思路较为清晰，内容比较全面，体现出作者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把握较好。但论文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意见 1:

一是语言不够流畅，建议作者参考杂志的要求好好梳理语言，要清楚流畅。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肯定和指导。我们已参考杂志的要求逐句阅读全文，重新梳理语言表述，对文中存在的病句、用词不精确等问题做出了修改和完善，以增加读者对集体欢腾现象的理解。

意见 2:

二是论文的框架需要调整，综述的写作不像学位论文，要对梳理的内容的布局做进一步完善。可以不要引言，直接从这一现象的概念出发层层递进式地论证。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删掉引言部分，开篇直接引入集体欢腾概念进行递进式地阐述。

意见 3:

三是对这一现象的交代不是特别清晰，这一现象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和日常生活中某些现象的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说明。

回应：多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开篇第一、二段加入了集体欢腾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个人情绪会因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集体欢腾是在大型集体活动中，如音乐会、电影院、体育比赛或节日典礼上，你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同步化。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个时刻，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刻，可能是观众在欣赏一些美妙音乐的时刻，可能是中华民族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亦可能是奥运会运动员夺冠的时刻。这是一群甚至可能不认识彼此的人共同进行同样的事所带来的一种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便以部族、村落等方式群居，除了与宗教信仰关联的集体仪式

外，还创造了许多世俗中集体参与的集体欢腾活动。例如：中国各民族的民间集体传统节日中，常见集体欢腾现象。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人人手持火把，齐步奔走，最后将手中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巨大的篝火，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在载歌载舞中集体狂欢。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傣族的泼水节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亦是民间集体欢腾的体现。个人的情感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强烈的集体情感，收获一种与有荣焉的幸福感。

最后，再次感谢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审阅我们的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极具建设性，让我对研究主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也提升了文章的逻辑性、严谨性和通畅性。

此致

敬礼！

所有作者